

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形成 机制的区域差异 ——基于变截距模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江 源,谢家智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文章依据金融发展理论,基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沿用二元结构分析方法,将经济规模、经济效率、收入与制度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利用198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变截距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形成机制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工农部门产出差异的扩大不仅没有加剧二元金融矛盾,反而抑制了城乡金融反差的扩大;经济转型、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经济效率的提升有助于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矛盾。不同的是,以功能财政化体现的金融制度供给对中、东部地区城乡金融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却是强化西部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诱因;城乡收入差异对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因此,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更需要通过深化城乡融合和加快经济转型来实现。

关键词:二元经济;金融发展;二元金融;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3)07-0072-10

一、引 言

金融发展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引人注目的变量,同时也是牵动宏观经济波动的最直接因素(张杰,1995),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反差(Bardhan,1999),这种反差同样体现在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服务的金融体系中。然而,在金融发展主流研究重总量、轻结构观念的影响下,关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中,多数情况下城乡二元金融格局仅被作为一个特征事实予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充

收稿日期:2013-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GL008);教育部规划项目(12YJA79014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309004)

作者简介:江 源(1986—),男,重庆北碚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谢家智(1967—),男,四川西充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证明,忽视结构的总量关系难以揭示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点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被直接观察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总量一直高速增长。1990—2009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从1 017.5亿元跃升至14 863.3亿元,M2/GDP从0.817增加到1.778。然而,金融总量的快速扩张难以掩盖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失衡的矛盾。截至2009年,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①占比高达89.76%,而短期贷款中农业贷款占比却仅为14.75%,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占金融机构现金支出比例也只有1.73%。以上数据充分说明,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过程中,我国的城乡金融二元差异反而呈现出强化趋势(陈成忠等,2006),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二元经济格局与二元金融结构的关系,关注与重拾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农村金融乏力的困境。本文构建了一个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影响因素的简单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性。

二、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考察城乡二元金融差异主要基于两个视角:第一类研究认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源于城乡之间金融发展的经济环境差异。首先,农业发展具有低效率、高风险的特征,金融机构的盈利取向和金融资源的逐利本质将推动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城市部门(谢平和徐忠,2006;鲁钊阳和冉光和等,2012)。刘芳(2002)、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杨国中和李木祥(2004)等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在效率主导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不具备自我发展的基本条件。其次,从金融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的劣势更为突出。发展中国家金融中介的成本普遍较高,城市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购买金融中介服务(Townsend,1978、1983)。而受收入水平限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几乎难以进入农户的视野(王芳,2005),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性更是钳制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形成,这一观点得到了韩正清等(2010)的实证结果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则进一步指出,农村低收入人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库兹涅茨特征,从长期来看,城乡二元金融差异呈倒U形变化趋势。

与以上研究关注金融发展的内在条件不同,第二类研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性,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金融资本流动不仅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受到国家或地方政策的引导(曾康霖,2003、2008;褚保金和莫媛,2011)。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集中资源推进新型工业化,国家在金融制度方面采取的是城市优先的策略(林毅夫,2004),强制性地使农村金融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鲁钊阳等,2012)。由于我国是国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资源,并且金融中介履行了部分财政资金的职能(张杰,1997;周立,2005),因

此,在重城市、轻农村的歧视性金融制度下,金融制度配给的差异导致城乡金融发展分化加剧。

综观已有文献,城乡二元金融问题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得到了初步的讨论,虽未形成理论体系,但学术界就金融结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已达成了共识。不难发现,沿着经济决定金融的思路,主流的研究范式仍然拘泥于从经济总量的角度分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这些以宏观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忽视了我们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一极其重要的基本特征,因而难以揭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有关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大多基于理论推演或经验判断,仅有的实证研究也基本采用单一经济变量的分析,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鉴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殊制度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各种经济、制度因素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为此,本文尝试从区域维度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三、理论分析

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既受经济因素的制约,更受市场和制度的影响;既有内在动力的支撑,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而且在不同阶段,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和作用条件差异明显。Patrick(1966)将金融发展划分为供给导向型(Supply-Leading)和需求跟进型(Demand-Following)两种模式。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金融发展的主导性和超前性。一般而言,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或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通过政府主导的金融供给,扶持和促进金融业的优先发展;或者通过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创新,实现金融资源从传统的或不具有增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单位或部门转移到现代新兴行业,以主动“创造”金融需求的方式加速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显然,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难以在市场主导下实现,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金融制度配给通常是该模式下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因。与之相对应,需求跟进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认为金融发展依赖于真实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一般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居民消费剩余就越多,从而会产生更强的储蓄能力和投资需求;同时,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企业将会产生更多的外部融资需求。需求跟进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决定作用。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是金融发展所需要素禀赋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结果,因此,总体上金融发展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形成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尚在发育的阶段,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更为重要,此时,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更多地受到金融制度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较为成熟的阶段,金融发展更多地表现出

需求跟进的特征,在这一阶段,金融需求的二元性可能成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主要诱因。因此,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促进城乡金融发展的因素也具有差异性。在区域经济非均衡的背景下,分析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与演化规律必须将区域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一方面,区域经济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环境和基础,在国家梯度开发战略推进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而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强度不尽相同。受此影响,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将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因此,区域维度的划分体现了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决定要素的非均衡分布不仅表现为城乡反差,更呈现为区域的非均衡性。金融发展要素分布的区域差异将直接影响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规模,从而影响城乡之间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结构。鉴于此,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机制在区域间表现出复杂的动态性特征,无视区域差距的总量分析将掩盖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真实驱动因素。本文对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将基于以上理论探讨建立分析框架,并在划分区域维度的基础上展开分析。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金融发展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共同影响。已有文献利用经济规模、经济效率、经济结构、收入水平、政府干预和法律保护等变量对以上两方面因素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考察(Goldsmith,1969;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Levine,1993、1998;Harris,1997;Rajan 和 Zingales,2003;La Porta,1998、2002;谈儒勇,1999;卢峰和姚洋,2004;王鸾凤和黄霆珺,2006;郑志刚和邓贺斐,2010;张金清等,2010;石盛林,2011)。然而,影响金融发展的各种因素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有何关系,各种因素对金融总量增长和城乡金融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却鲜有学者关注。显然,在二元结构下,以经济金融总量关系来解释金融结构问题并不合理。例如,城乡金融发展不仅取决于金融资源的积累,更要考虑城乡之间金融资源的流动。为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来分析经济总量差异和质量差异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了收入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量来考察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二元性在不同阶段对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建立如下金融发展函数:

$$F=f(Y,E,M,W) \quad (1)$$

其中,F代表金融发展水平,Y代表经济规模,E代表经济效率,M代表制度因素,W代表收入水平。沿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我们将经济部门划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分析我国农村经济金融问题时有效样本十

分有限,简单模型的应用十分必要,为此我们假定函数为指数形式,且两部门金融发展函数的差异仅反映在常数项上,则传统部门的金融发展函数表示如式(2)所示:

$$F_{it}^r = \omega_{it} Y_{it}^{\alpha} E_{it}^{\beta} M_{it}^{\theta} W_{it}^{\lambda} \quad (2)$$

式(2)两边分别取对数有:

$$\ln F_{it}^r = \epsilon_{it} + \alpha_{it} \ln Y_{it}^r + \beta_{it} \ln E_{it}^r + \theta_{it} \ln M_{it}^r + \lambda_{it} \ln W_{it}^r \quad (3)$$

同理,工业部门的金融发展函数可以表示为:

$$\ln F_{it}^u = \delta_{it} + \alpha_{it} \ln Y_{it}^u + \beta_{it} \ln E_{it}^u + \theta_{it} \ln M_{it}^u + \lambda_{it} \ln W_{it}^u \quad (4)$$

合并式(3)和式(4)有:

$$\ln f_{it} = \gamma_{it} + \alpha_{it} \ln y_{it} + \beta_{it} \ln e_{it} + \theta_{it} \ln m_{it} + \lambda_{it} \ln w_{it} \quad (5)$$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利用式(5)可以考察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于是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 f_{it} = \gamma_{it} + \alpha_{it} \ln y_{it} + \beta_{it} \ln e_{it} + \theta_{it} \ln m_{it} + \lambda_{it} \ln w_{it} + u_{it} \quad (6)$$

其中, γ_{it} 为变截距系数, f_{it} 表示*i*地区*t*期的城乡二元金融水平, y_{it} 、 e_{it} 、 w_{it} 和 m_{it} 分别表示*i*地区*t*期的城乡经济规模差异、城乡经济效率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异和城乡金融制度差异, u_{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根据以上分析,模型变量涉及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城乡二元金融水平、城乡经济效率差异、城乡金融制度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异和城乡经济规模差异五个方面。限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我国 20 个省、直辖市 1980—2009 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作为基础数据。为了充分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二元金融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我们根据人均 GDP 指标将以上省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②具体指标说明如下:

(1)城乡二元金融结构(f_{it})指标。衡量城乡金融差异的常用方法是对 FIR 指标进行结构化处理,即分别计算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 FIR 指标(赵伟,2006;鲁钊阳,2012)。由于 FIR 指标是对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衡量,在其基础上无法直接构建二元金融反差的衡量指标。实际计算中,一般用城乡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近似表示。由于本文对城乡金融差异的考察是基于金融规模的角度,我们以各省非农业贷款和农业贷款之比来更加直观地反映城乡二元金融差异。

(2)城乡经济效率差异(e_{it})指标。经济效率变量一般通过资本产出率和劳动产出率来测度(张金清和蒋水冰等,2010)。由于本文的金融发展函数中引入了经济规模和收入变量,直接采用资本产出率或劳动产出率将导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从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来看,剩余劳动力转移直接反映了城乡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结果的支持,如俞立平和周曙东(2006)、戴永安和张曙霄(2010)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的测度表明,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分区域考察,人口城市化对提升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而周勤和杜凯(2009)、李刚(2012)实证分析发现,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农业的效率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杨国中和李木祥(2004)基于城乡和省际两个维度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信贷资金与劳动力呈现同向流动的趋势。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以劳动力结构作为城乡经济效率差异的替代变量,以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表示。

(3)城乡金融制度差异(m_{it})指标。金融制度差异体现在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上。我国金融具有功能财政化的特征(周立,2005),而政府干预金融配给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财政资金配套来引导(傅勇,2012;周丞,2012)。基于以上特点,已有研究做了一些共性的选择,即以非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金融制度的替代变量,本文沿用了这一做法。

(4)城乡经济规模差异(y_{it})与城乡收入差异(w_{it})指标。经济规模差异采用第二、三产业年度 GDP 与第一产业年度 GDP 的比例来表示,城乡收入差异则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衡量。本文涉及的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2011)、《中国金融年鉴》(1990—2011)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信息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的影响变量并不仅限于本文模型设定的范围,除了以上变量之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鉴于此,在金融发展模型的设定中,遗漏变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研究集中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同时避免模

表 1 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地区	检验类型(统计量)	统计值	P 值	H_0
东部地区	个体效应检验(F)	16.62***	0.000	$\mu_i = 0$
	Hausman 检验(χ^2)	17.90***	0.003	μ_i 与解释变量均不相关
	Wald 检验(χ^2)	304.30***	0.000	$\sigma_i^2 = \sigma^2$
	Wooldridge 检验(F)	81.66***	0.000	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
	B-P LM 检验(χ^2)	94.51***	0.000	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
中部地区	个体效应检验(F)	26.51***	0.000	$\mu_i = 0$
	Hausman 检验(χ^2)	12.06**	0.034	μ_i 与解释变量均不相关
	Wald 检验(χ^2)	163.28***	0.000	$\sigma_i^2 = \sigma^2$
	Wooldridge 检验(F)	88.46***	0.000	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
	B-P LM 检验(χ^2)	132.98***	0.000	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
西部地区	个体效应检验(F)	8.36***	0.000	$\mu_i = 0$
	Hausman 检验(χ^2)	4.07	0.539	μ_i 与解释变量均不相关
	Wald 检验(χ^2)	8.81	0.185	$\sigma_i^2 = \sigma^2$
	Wooldridge 检验(F)	22.40***	0.005	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
	B-P LM 检验(χ^2)	88.84***	0.000	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型设定偏差带来的虚假回归问题和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模型设定中,虽然进行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但基于对我国金融发展省际差异的经验判断,模型中存在个体效应。模型设定检验结果(见表 1)证明了以上判断的合理性。为了进一步确定个体

效应与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我们采用 Hausman 检验进行考察。东、中部地区检验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西部地区检验结果支持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长面板数据(时间维度 t 大于截面维度 n),一般存在异方差性,又由于金融发展函数设定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随机扰动项自

相关难以避免。此外,根据陈安平(2007)、薄文广和安虎森(2010)、杜家廷(2010)等的研究,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样本截面之间也可能存在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推断,有必要讨论模型随机扰动项的特征以确定模型的估计方法。由 Wald 检验、Wooldridge 检验和 Breush-Pagan LM 检验的结果可知(见表 1),本文面板数据随机扰动项同时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组间存在截面相关。显然,利用 OLS 估计无法得出无偏和一致的估计,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最适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别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模型回归结果

地区	变量	系数	统计值	P 值	地区	变量	系数	统计值	P 值
东部地区	lny	-0.290 *	-1.81	0.070	中部地区	lny	-0.253 **	-2.18	0.029
	lnw	0.831 ***	2.87	0.004		lnw	0.274	1.53	0.126
	lnl	0.287 **	2.14	0.033		lnl	0.260 *	1.88	0.060
	lnm	0.526	0.67	0.501		lnm	0.526	0.61	0.544
	γ_1	5.524 ***	9.29	0.000		γ_1	2.752 ***	11.81	0.000
	γ_2	4.009 ***	-4.20	0.000		γ_2	2.560	-1.07	0.286
	γ_3	3.932 ***	-3.18	0.001		γ_3	2.425	-1.48	0.140
	γ_4	2.908 ***	-4.59	0.000		γ_4	2.719	-0.20	0.841
	γ_5	2.103 ***	-6.35	0.000		γ_5	2.492	-1.32	0.187
西部地区	γ_6	2.168 ***	-5.72	0.000		γ_6	3.399 ***	2.83	0.005
	γ_7	2.780 ***	-5.67	0.000		γ_7	2.328 *	-1.89	0.059
	lny	-0.183 **	-1.96	0.050					
	lnw	0.184	1.32	0.187					
	lnl	0.137 **	2.05	0.041					
	lnm	0.157 ***	2.82	0.005					
	c	2.134 ***	9.88	0.000					

注: γ_i 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个体特征(截距项)。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差距与城乡二元金融水平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工业部门经济规模的适度领先有助于抑制城乡金融反差的扩大,这一结论也说明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总量关系来解释城乡金融结构差异与我国金融发展的事实不相符。以劳动结构反映的经济效率差异变量系数在三个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城乡经济效率差异对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也体现了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与以上两个变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差距和制度因素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前者的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且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金融需求差异是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重要诱因。收入差距变量在西部地区模型中不显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金融需求,因而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对金融发展的作用都不明显;第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相反,金融制度差异对城乡二元金

融结构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正,但仅在西部地区显著,说明城市倾向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刺激了西部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此外,分组回归中变量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也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机制具有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演变的规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经济效率差异和制度供给差异共同影响了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在中部地区,金融供给差异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开始弱化,城乡金融分化主要由经济效率驱动;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效率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同样存在,而收入差距引致的金融需求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依据金融发展理论,基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沿用二元结构分析方法,将经济规模、经济效率、收入与制度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划分区域维度,利用变截距模型,构建 1980—2009 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形成机制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工农业部门产出差异的扩大不仅没有加剧二元金融差异,反而抑制了城乡金融反差的扩大,这充分说明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在金融体系中同样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业劳动力与金融资源同向流动,说明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业部门仍然具有比较效率优势,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作用。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差异,以及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差异,不同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的形成具有区域特征。以功能财政化体现的金融制度差异对中、东部地区城乡金融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却是强化西部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诱因,说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受到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影响,也说明西部地区的金融控制强于中、东部地区,这与王晋斌(2007)对我国不同地区金融控制强度的测量结果相近。收入分配差异对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说明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具有“需求导向”的典型特征。

本文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晰,即解决区域二元金融反差问题无法通过简单缩小区域经济产出差距来实现,也难以通过增加对落后地区的金融供给来完成。总的来看,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全方位的经济社会转型来实现。一方面,以产业结构优化来带动劳动力结构优化,加速形成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拐点;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城乡统筹来整合农业农村资源,消除城市部门的效率比较优势。而从我国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来看,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解决还有赖于金融供给从总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调节收入分配则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 ①本文所说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 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以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内蒙古、辽宁代表东部地区,吉林、山西、湖南、河南、海南、宁夏、青海代表中部地区,广西、江西、甘肃、新疆、云南、贵州代表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

- [1]陈成忠,赵晓春.二元金融格局下的县域信贷弱化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60—166.
- [2]褚保金,莫媛.金融市场分割下的县域农村资本流动——基于江苏省39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88—97.
- [3]韩正清,王燕,王千六.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理论关系与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2):118—123.
- [4]刘芳.从资源配置角度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外流[J].金融研究,2002,(9):129—134.
- [5]卢亚娟,吴言林.二元金融结构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41—46.
- [6]鲁钊阳,冉光和,王建洪,等.城乡金融发展非均等化的形成机理及对策——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2,(3):172—173.
- [7]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4):90—100.
- [8]王芳.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J].金融研究,2005,(4):89—98.
- [9]王晋斌.金融控制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10):95—104.
- [10]王醒男.基于需求与发展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逻辑再考[J].金融研究,2006,(7):53—63.
- [11]杨国中,李木祥.我国信贷资金的非均衡流动与差异性金融政策实施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4,(9):119—133.
- [12]曾康霖.金融改革的回顾与评析[J].金融研究,2008,(4):1—8.
- [13]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J].经济研究,1997,(8):20—26.
- [14]张金清,蒋水冰,陈卉,等.基于VEC模型的我国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情况,2010,(10):47—57.
- [15]中国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剪刀差: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案例研究[J].金融研究,2004,(2):128—137.
- [16]周立.渐进转轨、国家能力与金融功能财政化[J].财经研究,2005,(2):26—37.
- [17]Bordo M, Rousseau P. Legal-political factor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finance-growth link[J].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06, 10(3): 421—444.
- [18]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

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076—1107.

[19]Greenwood J,Smith B.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7,21(1):145—181.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ual Urban-rural Financial Structure in China: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a Varying-intercept Model

JIANG Yuan,XIE Jia-zh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dual structure to introduce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scale, economic efficiency, income and institution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financ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n through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80 to 2009, it constructs a varying-intercept regression model and studie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ual urban-rural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output differences between industry sector and agriculture sector does not exacerbate dual financial conflicts, but inhibits the rise in the gap between urban finance and rural finance instead; under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tegrated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increase in economic efficiency helps to ease the urban-rural financial structure contradicti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 supply embodied by function fiscaliz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urban-rural financial differences in central and east China, but is the key reason for intensifying urban-rural financial structure in west China; the effect of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ces on dual financial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 only in east China. Therefo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finance needs to depend on deepen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ccelerating economic transition.

Key words: dual economy; financial development; dual finance; regional vari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